



回忆在校团委工作的那几年

○贺美英（1961届电机）

1963年暑假前后，我从电机系分团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到校团委工作。同时上调的还有单德启、承宪康、崔鸿超、贾春旺、陈清泰等10人。上调原因是由于当年一些在团委工作较长时间的干部被充实到了机关各部处，需要给团委增加新鲜血液。从那时到“文革”爆发不到3年，但这却是我进入清华后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工作上得到很大锻炼的一段时间。随着对学校情况了解的增多，包括“文革”中大字报“揭露”出来的“内幕”，特别是后来通过学习、反思学校的历史，从今天的高度回过头去看几十年前走过的路，我明白了当年在蒋南翔校长领导下，清华大学党委加强团委干部队伍是出自重要的战略思考，要使学生工作和思想教育走上正轨，纠正以往各次运动和工作中“左”的思想和做法，用深入细致有针对性的工作方式代替轰轰烈烈搞运动的方式，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培养干部的基地。

坚持实事求是，划清是非界限

1964年，在校党委领导下，刘冰、艾知生同志带领张慕萍、方惠坚、谭浩强等团委主要干部，在1961年拟定的《班级团支部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界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和一些问题的界限》（修改稿草案）。从这个文件的名称看，已经超出了清华大学的范围，很有可能反映了蒋南翔同志的一些工作思路，是蒋南翔同志



贺美英教授

和清华大学党委纠正“左”的错误、扭转“左”的偏向的一次顽强努力。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左”的路线对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整风反右”和反右倾运动是“左”的路线的直接后果，而“大跃进”运动中的高校教育革命和从1957年末开始的“红专辩论”，也受到了“左”的路线的严重干扰。这些运动中“左”的错误和偏向，对清华大学造成了严重影响。这既有自上而下的“左”的路线强势的因素，也有学校领导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即便如此，对有些“左”的错误和偏向，党委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纠正。

根据何东昌夫人李卓宝老师的回忆，反右期间，蒋南翔和何东昌都认为不必要在青年学生中划右派，蒋南翔向中央有关领导人提出了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在部分“极右”学生被送出学校劳动改造前，蒋南翔曾召集他们开座谈会，坦承原来以为只是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没想到

□ 回忆录

还有这样的组织处理。并说“下去结合自己的专业好好劳动锻炼，过段时间再把你们接回学校完成学业”。当年团委承宪康参加了会议。我校经管学院1981级校友李山说，他的舅舅彭伟君1953年考入清华动力机械系，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

“文革”一开始被送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劳改，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到组织上为他彻底平反。改革开放后由于对工厂发展有突出贡献，晋升为高工并被评为劳动模范。彭伟君虽然受到过错误对待，但仍对学校充满感情，他曾向李山讲过蒋南翔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记得这个会是在1958年3月召开的。另外，大约在1961年有部分右派学生摘掉了帽子。蒋南翔校长召集他们开座谈会，方惠坚参加了座谈还做过记录。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蒋南翔用“望子成龙”表达了对这些学生的殷切期望，而这成了“文革”中批判他的“罪状”之一。

在教育革命中有的同学激情之下说了一些过头话，蒋南翔校长总是会进行纠正。他在听取各系汇报时听说有的班上的同学要批判“麦克斯韦方程”，立即指出



20世纪50年代末，团委干部在明斋团委办公室前合影

这是不对的，科学规律是不能随便批评、打破的。“红专”辩论中有个同学说我就想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被指为“白专”。蒋南翔知道后表态说这不是什么“白专道路”，如果清华出了爱因斯坦，那是我们学校的光荣。

据刘冰同志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蒋南翔多次提醒要注意“左”的影响，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中简单化的倾向。从1960年10月开始，清华党委就要求学校团组织多次在干部中进行政策教育。到1961年2月，刘冰指导校团委拟定了《班级团支部工作任务要点》《班级团支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点》和《班级团支部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界限》三个文件的初稿，分别在分团委干部训练班和团支部书记训练班讨论之后，修改定稿印发各党支部和学生团支部讨论执行，并上报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

这三个文件尤其是《班级团支部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界限》，政策性很强，规定十分细致、明确，总共50条，基本涵盖了班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其中涉及的许多原则问题，在党的工作中也是完全适用的。根据刘冰同志的回忆，当年《红旗》杂志将这个文件选登在《内参》上。一次他和蒋南翔参加中宣部例会，康生在会前质问蒋南翔：“好家伙，你一个学校可以制定团的工作条例，真了不起！能这样吗？”会后，蒋南翔对刘冰说，我们这个文件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学校的实际和工作需要出发制定的，是好的，合法的。这个文件后来对

高校工作“60条”中关于学生思想工作的内容也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这说明，清华大学党委从1960年下半年就开始反思以往运动中“左”的错误和偏向，开始着手纠正并消除它所造成的影响。

1961年6月30日蒋南翔校长在清华大学教师大会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学校工作中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他指出，我们有些做法使我们得到了成绩，同时由于掌握得不够好，或者过了头，就走到反面，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又红又专是完全正确的，但掌握不好界限就会发展到红而不专、红而反专、以红代专的错误，如把科学上的定理当成资产阶级的旧垃圾。如在学校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是对的，但对“一条龙”“大兵团作战”等经验如果宣传过了头，离开了其本来的意义，就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抹杀个人的积极性。如提倡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话说过了头，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普通劳动者，那还有什么必要办大学？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斗争是需要的，但把这种斗争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就混淆了政治问题和科学问题的界限，违反了党的“双百方针”。蒋南翔还特别提到了所谓“新富农”问题，这原本是指有的贫雇农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发展起来，就不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被称为“新富农”。蒋南翔以此来比喻一些年轻教师被培养起来后，不愿意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后来他了解到，这一比喻被当成了衡量教师的一把尺子，并出现了“新富农路线”的说法。他意识到对业务好的教师扣上“新富农”“白专道路”的帽子是扩

大化、简单化，是完全错误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蒋南翔在大会上郑重宣布，对被扣了这些帽子的同志全部一风吹，行脱帽典礼。他指出，对有些思想问题要进行帮助，但决不能扣这样的帽子。这里蒋南翔校长所强调的，就是要划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真理、正确的东西，一旦过了头、超出了自己的界限，就变成了谬误。

可见，从1961年拟定团支部工作的“50条”界限，到1964年在“50条”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出新文件，是清华党委对纠正“左”的错误，清除“左”的影响所做的非常严肃的工作，是通过指导共青团的学生工作来进行的。

转变工作方式， 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工作中划清是非界限，还要转变工作方式。采取搞运动大呼隆的工作方式，就非常容易过头，产生扩大化、简单化的问题。我到团委工作后，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50条”的第一条是要区分政治上的错误观点和思想认识问题，共分了6个小



2019年11月14日，清华共青团委60年再相聚，后排右3为贺美英

□ 回忆录

点，其中绝大部分规定的是工作方式问题。如不能给政治观点错误的同学乱扣帽子、班级不得擅自召开批判会、在帮助的过程中不能用对敌斗争的口号、不能违法乱纪等。那个时期中苏大论战的焦点之一是南斯拉夫问题，当时中方认为南斯拉夫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把铁托称为修正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有一名新生，入学公开说喜欢铁托，要做铁托那样的人。这在当时可是典型的“反动言论”。但是根据“50条”的规定，团组织并没有对这个在内部被戏称为“小铁托”的同学进行批判斗争，而是采取与他个别谈心交换思想的方式进行帮助。那时艾知生同志多次与这个同学谈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后，看重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成为一个显著特征。那时，社会上有的高考学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了报考保密、涉外专业的自由，有的甚至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在“50条”中，明确要把阶级分析和唯成分论区别开来，并提出了不要把本人的家庭出身当作本人的政治态度、不要把同学与剥削阶级家庭有某些必要的联系当作政治思想上与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等具体要求。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而搞运动就一定会走到荒谬的地步。事实上，那时清华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相对是比较好的。

我到团委工作后，先是担任学习劳动部的部长，贾春旺是副部长，后为部长。在这个岗位上，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深入细致的工作，并初步学会了如何开展这样的工作。

那时，经历了几番政治运动和三年经

济困难时期，停止了批判斗争，也没有工作组之类的外来干扰，是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学校可以大力地抓业务学习了。我们在学习方面首先是对全校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写出了报告。团委要求每个干部都要联系一个班级，我那时还在系里兼任电工基础课的助教，给学生答疑和上习题课。我经常到学生宿舍去答疑，还要去找那些上课时提问少或学习成绩有点问题的学生个别交流，进行辅导。这样深入细致的工作对我自己的成长提高帮助极大。还记得给同学上习题课时，我常常准备了许多习题，一道一道地讲解，费了很大工夫但效果并不好。后来去听了老教师讲习题课，是和大家一起分析一道题有几种解法，然后比较哪种解法更好。讲的习题不多但给大家的启发很大。在这样深入的工作中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还有就是对一些特殊学生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如学校对一些学习拔尖的学生进行调查，给他们配备导师，加强个别培养。后来“文革”中把校级的拔尖生称为从万人里挑出来的“万字号”，而把系里的尖子生称为“千字号”。蒋南翔校长提出，为了这些拔尖生的全面发展，不仅注意业务上的培养，还要求在暑假给他们安排一些军训、劳动课。业务上的安排由学校教务部门推动各系进行，而军训、劳动就由我们来安排。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文艺、体育社团，这个群体有两个集体，一个是班集体，一个是社团集体。学校为他们安排了专门的宿舍，有的体育社团还特殊安排了食堂，在社团里成立了党团支部，有的同学就在社团里入了党。我们对社团同学的学习情况很注意，帮助

有困难的同学，使他们在两个集体中都得到发展。在学校的关心和团委的工作下，文体社团对于每个成员有很强的凝聚力，很多人在毕业后还保持着联系，甚至到了老年还经常组织聚会，唱歌跳舞。胡锦涛在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一直参加他们的活动。

给我印象很深并且一直影响着我来后工作的，是学校对女生的关心。由于经济困难时期营养不良和活动量过大等原因，一些女生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有的甚至不来例假。学校对此非常重视，成立了女生工作组，由党委委员李卓宝任组长。在后来的工作安排中，特别注意女生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惯。如在七饭厅开设了女生食堂，在不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尽量把菜做得精细一点，种类多一点。考虑女生的饭量，馒头和包子有一两个的，不像其他食堂都是二两一个。在劳动、军训的安排中，也考虑到女生的特点。1965年的学生军训，就专门成立了女生大队，由我任大队长，化工系汪昆华任副大队长，在200号进行军训。期间的活动都考虑女生的承受能力，对个别在生理期或身体不适的女生做特别安排。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一提，就是学生中的高干子女。我们党的很多老干部的子女这时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经过高考入学，哈军工、北大、清华都是他们选择较多的学校。那时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全校副部长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有80多人。据说毛主席曾在一个小范围的干部会上讲到了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指出对他们要严格要求，干部子弟要“接班”而不是“接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不能高高在上。蒋南翔校长召集部分高干子女开



2023年5月，五六十年代老团干部在清华园工字厅聚会，右2为贺美英

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且给他们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如要搞好学习，要参加班集体活动，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化，等等。根据学校的要求在各系安排辅导员特别关注高干子女的情况，并安排一些教师及时解决他们学习中的困难。后来的调查表明，这部分学生学习上都很有努力，成绩大多在中上水平；在班级里表现大都不错，有些入了党，担任了班干部。周末回家都是骑自行车或是乘公共汽车，不让家里的小汽车接送。为了让他们了解社会、了解农村，有一个寒假由我和贾春旺带队，领着大约30个高干子女到清华北边的上庄公社参观，访贫问苦。现在的上庄已经很发达了，坐车去也很快，但那个时候还是显得偏远落后。我们去住在贫下中农家，我带着几个女生住在一个姓李的贫农家。这位户主虽然只有40多岁，但显得比较苍老。几个女生进屋后见了他张口就叫“大爷好”，随行的村干部马上低声纠正，“叫大哥就行了”。大哥土改翻了身，住的房子很大，但屋内几乎一无所有，只在炕边盘了一个地灶。我们住在另一个房间，在生产队集中吃饭。有一次我

□ 回忆录

们在他的屋里看到他正在地灶的锅里用水煮地瓜叶，同学就问他：“大哥，你在煮猪食吗？”弄得人家十分尴尬，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在做饭！我过去也听说过农村生活很苦，但没想到解放后这么久了，在北京城不远的地方，农民的生活还是这么艰苦！我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相信这些同学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在党委的关怀下，在团组织中成长

我到团委工作后，“左”的影响基本排除了，工作作风也转变了，直到“文革”爆发前，那是一个对我的成长影响非常大的时期，也是我非常留恋的时期。

蒋南翔校长在团中央工作过，他十分信任共青团的干部，也放手大胆地使用共青团的干部。制定学校共青团工作的“50条”，实际上体现的是清华大学党委的思想，是蒋南翔指示刘冰等同志亲手抓的十分重要的工作，但党委还是放手要团委的年轻干部参与研究、讨论并承担主要的写作任务。

团委的主要干部曾参加在三堡召开的党委常委扩大会，到会的除常委外，还有一些系的分党委书记。那时我们很年轻，对一些书记虽闻其大名却较少有近距离接触。比如李传信同志，我们都听说这个人很厉害，很能尅人。但在会议间歇，传信同志与我们交谈时却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其他的一些书记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与会的同志没有上下级的尊卑，十分民主，讨论问题时经常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吵，但形成决议时又非常一致。亲临现场，耳濡目染，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教育很大。

清华的团委正是在这种榜样的引领

之下，形成了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保持统一意志又和谐舒畅的工作氛围。团委的干部之间，既是同志式的关系，又充满了年轻人的欢乐气氛。在会议上，大家不分职务高低，完全自由讨论，相互间可以插话。形成决议后大家都自觉遵守，统一言行。团委干部之间，没有利益之争没有相互猜疑。“文革”前学校曾进行过一次职称提升，无线电系的张克潜和团委的张慕萍是那批提升为讲师的代表，张克潜是搞业务的标杆，张慕萍做政治工作突出。张慕萍提升为讲师，团委没人有嫉妒心，因为他比我们多了十几块钱的工资，大家有时会起哄喊“张讲师请客！”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清华团委勇于承担重要的工作任务，党委也放手给团委干部压担子，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我们这些刚到团委工作的干部，由于都承担过独当一面的工作，所以成长较快。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还是那次带领学生到上庄公社参观学习。那次去了不到10天时间，一天晚上一个男生宿舍因生煤炉取暖发生了煤气中毒，幸亏一个同学起来上厕所晕倒在了屋门口，醒来后他立即叫醒了其他人，这才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这件事的发生使我受到极大警醒，真正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重大，有时候是人命关天啊！我好像一下子就成长了起来，成熟了起来。

这段在团委工作的难忘经历，虽然从时间上看是短暂的，但却是我受到很大教育和锻炼的几年。清华党组织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团结一致的班子风气、又红又专的自我要求，这些都从这个时期开始深深地铭刻于我的心中。